

### 第三届“亚洲未来”会议报告#

#### ◆今西淳子《“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报告》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上午9点至12点30分，“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在北九州国际会议中心的国际会议室召开。日本、中国、韩国的历史研究者们齐聚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定员88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可见大家对此会议的关注度之高。

一开始，早稻田大学的刘杰（Liu Jie）教授在提出话题的环节中，以“为何要进行‘国史对话’”、“从‘国史’到‘历史’”、“培养可对话的‘国史’研究者”为题指出，我们承认最近十几年间围绕日本、中国、韩国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对话成果、以及随着留学生的增加与大学国际化而产生的由“国史”到“历史”的转变，但为了将“国史”对话进一步实质化，在进一步促进当前的研究者同行们交流的同时，创造一个10年或20年后可以真正进行国史对话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高丽大学的赵琰（Cho Kwang）名誉教授认为东北亚的历史问题来源于民族中心主义及国家主义的倾向，并分析了韩国近来编纂的学校教科书、学会的日本关系史和中国关系史中的记述。（1）在“前近代中国的记述”中，通过围绕着高句丽史的混乱提及了“华夷意识”，此外，（2）在“前近代日本的记述”的结论中，主张“整体上在（韩国的）教科书中看到的前近代日本，作为文化的后进国是（朝鲜的）先进文化的受益者，并且是一副侵略者的姿态。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妥当的，但并不正确。国史教科书不把日本视为一个切实的关系主体，很难想象这种认识会对解决现在围绕着韩国的种种难题、对打造正确的韩日关系有所裨益”。并且赵教授指出，（3）在“近代东亚的记述”中，19世纪以后的东亚，三国历史错综缠杂，仅凭一国的情况来记述本国史已近乎不可能。但在韩国的近现代史中，基本找不到与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史相关的内容，就算是朝鲜战争部分也净是关于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说明，没有介绍参战各国的线索。赵教授最后总结道，在研究近现代史时，不应单单只读中国史，而应通过和日本史联结起来的叙述来理解整个脉络；另外，阅读自己固然是重要的工作，但如何阅读他人才好，这也是很重要的课题。

复旦大学的葛兆光（Ge Zhaoguang）教授以“蒙古来袭”（1274、1281）、“应永之役”（1419）、“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为例，阐述了国别史与东亚史的差异。从一国史的视角来看，就像是一个圆心的中心部分非常清晰，而周围部分模糊。如果有数个圆心，就会形成数个历史圈，就会出现重合的部分。在谈及东亚史时，就有必要突出这些历史圈重合的部分。比如说，日本史中记载，由于蒙古来袭，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认为是“神国”，开启了日本文化独立的端绪，脱离了中国的“华夷秩序”。然而高丽被蒙古化，在蒙古人入侵日本时成为了蒙古的前线基地。另一方面，在中国，蒙古/元朝被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本国史”，蒙古来袭被认定为在蒙古、日本、高丽这些中国之外的地方发生的事。从东亚整体的视角来看，可以将蒙元侵略日本（或是将高丽变为附属国的事）解释为不仅在东亚的政治层面，也在文化层面唤起了东亚各国的自我意识，也是东亚的“中国中心”风潮开始渐渐转变的契机。同理，应永之役的发生及解决造就了其后数百年间东亚国际关系的稳定。“壬辰之役”大大动摇了一直以来稳定的东亚国际关系，为之后东亚集体身份的崩溃埋下了伏笔，但当时这一事件很快就被平复，东亚的平衡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欧美各国以武力闯进东洋。然而中国的历史却明确表示，蒙元侵略日本及支配高丽，不过是蒙古人想支配世界的野心的表现，而

进攻朝鲜对马、邻国间的纠纷，以至“壬辰之役”中，日本才是侵略者，中国只是作为朝鲜的国际友人，两国携手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葛教授论述道，如果历史学家能进一步重新审视东亚史的视角的话，说不定会获得新的认识。

东京大学的三谷博名誉教授为了促进各国史的对话，(1)就日本高中历史教育课程修订的有关情况作了报告，(2)指出了日本史教科书中对世界、东亚的记述的争论点。“历史综合”预计将成为日本高中的必修学科。“历史综合”(a)将世界史与日本史融合，(b)将范围限定在近代史，(c)特点是倡导主动学习。但是，学会、教育会等会不会对这种动向提供支持还未可知。在日本史研究与教育的问题上，最近发生的与邻国的关系恶化给研究东亚中日本的定位的动向泼了一盆冷水。三谷教授说，能不能克服国内外蜂拥而至的政治压力、进行长期的有意义的发展仍然难以预料。此外，三谷教授(3)强调了互相学习邻国的国内史的必要性。三谷教授总结道，日中韩3国的知识分子们对欧美的热切关注与对邻国的毫不关心形成强烈对比，他对此深感担忧，除了国际关系，不了解对方国家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也是说不过去的，不要自以为已经了解了邻国的历史，应该互相、虚心学习，这才是“各国史对话”的终极课题。

在韩国、中国、日本的历史大家们进行了全局性的演讲之后，6名年轻的骨干研究者发表了评论。

北九州市立大学的八百启介教授首先指出了近代史上中韩日在对待欧美关系与东亚视点的比重的不同之处，在尝试进行论点整理的同时，八百教授表示，日中韩作为东亚的民族国家，通过将3国立场的差异和前近代东亚史从民族国家的视点上剥离开来重新审视的话，验证近代东亚的民族国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北海道大学的桥本熊副教授复原了1402年举办的足利义满接见明使的礼仪，并且详细说明了义满如何表现对明使的关照和敬意、如何将满足自尊意识的礼仪脱胎换骨的。要描述日本史，援用对外关系史的成果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单纯地认为只单单读懂外国史的文脉就可以。桥本副教授指出，应该在注意双方文脉的同时切实地核对各国的史料，进行冷静的判断，否则“国史”会有失偏颇。

早稻田大学的松田麻美女士以“中国教科书所描绘的日本：从教育的‘革命史观’到‘文明史观’的转换”为题，报告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但同时指出在习近平政权成立后，也发生了一些动摇和后退。

复旦大学的徐静波教授指出，在正确认识东亚历史时，不应拘泥于本国的立场，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另外，不应只研究本国的资料，也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各国的历史资料及考古学的成果，进行客观的考察。

高丽大学的郑淳一先生指出，为了推动“各国史的对话”有所进展，认真调查目前为止的官民级别的历史对话的事例、分析其与“各国史对话”项目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提出建设性的课题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他还提议大家一起考虑促进高中生、大学生级别的“对话”或者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年轻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交流的方法，以及以韩国高中的《东亚史》为参考，如何记述东亚的“国史”。

高丽大学的金kyongtae先生提出了如何确定共通的历史事件的用语这一问题，他认为不用“壬辰倭乱”而用“壬辰战争”为宜，但也介绍了存在反驳认为“这对韩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有些为时尚早”。此外，他指出，“国史教科书”与“国史研究”之前追求的目标是“自信感”和“光荣感”，但那如今已不是有效的目标，现在我们必须反映出各国的政治的、历史的特征。

2013年3月，第一届“亚洲未来”会议由（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于曼谷召开。“日本、中国、韩国各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以第一届的“全球化时代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圆桌会议为开端，历经重重讨论，在接受了2015年7月于东京召开的“寻求日本研究的新范式”论坛上、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教授提出的为创设“作为亚洲公共智慧的日本研究”的提案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来。此计划将连续召开5次会议，此次会议作为5次中的第一次在第三届“亚洲未来”会议中召开。今后，我们将在浓缩主题的同时，为身为日本人的日本史研究者、中国人的中国史研究者、韩国人的韩国史研究者们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本次活动的一大特征是多语种，会议之中，以下六位肩负了同声传译的工作。

（日语⇔汉语）丁莉(Ding Li：北京大学)、宋刚(Song Gang：北京外语大学)

（日语⇔韩语）金范洙(Kim Bumsu：东京学艺大学)、李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

（汉语⇔韩语）李丽秋(Li Liqiu：北京外语大学)、孙兴起(Sun Xingqi：北京外语大学)

今后的活动也期待以上各位鼎力相助。

此次会议的演讲记录将汇总为SGRA报告，以日语版、中文版和韩语版发行。

（文责：今西淳子）